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清末民初北京铜器作坊的转型与发展

周锦章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从对北京史志、民国户口档案、公私合营前作坊资料、碑刻和口述史的综合研究看，民国年间，北京铜器作坊的生产和销售，同地方社会的民族商贸和信仰习俗关系密切。手工业者通过资源互补的方式形成独特的生产和销售网络，牢牢地把生存的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行业发展模式。

[关键词]　民国；北京；铜器作坊；民族商贸；地方信仰中心
[中图分类号]　K25；K26　　[文章编号]　1002－3054（2015）06－0103－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615

在北京晚清至民国年间的历史上，一些手工业充分利用北京市民基层社会的特点，吸纳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保证了行业的生存，也增强了多元民俗社会的认同感。铜器业正是这样一个个案。铜器业，明清直至民国的地方史志和北京民国政府档案对它都有记载。北京绝大多数的铜器作坊均分布在安定门附近地区，这里既有北京藏传佛教信仰的中心雍和宫和东西黄寺，又有其他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往西就是鼓楼——地安门商业中心，往南是繁华的东四，往北则是当时的外蒙古宾馆（即外馆），是北京重要的外贸区。铜器作坊恰好位于多民族人群较为集中的市民经济圈中。它的技术传承人现在还可以调查，可以根据此田野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和建国初期的工商税务档案做研究，其产销运作与礼俗社会的关系资料构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系统，有利于我们进行观察和分析。同时，有关铜器作坊各种不同的资料在时间上还有一定的连续性，可以在清朝末年至1949年较长的时间段内进行考察。由于具备这些条件，笔者将铜器业确定为研究的个案。

一、北京铜器业发展简述

北京的铜器业是一种与市民基层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金属工艺行业，它的发展过程融合了多民族手艺人的智慧。关于其传入北京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最晚在元朝时，宫廷中首次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铜佛像雕塑，它们是西藏地区政权代表到北京觐见皇帝的同时，带来的众多贡品之一。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推崇备至，尊奉其首领为帝师，帝王登基时都要从帝师受戒。当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正如《元史·释老志》所说："帝师之甚尤，不可与古昔同语。"[1](P2948) 元统治者尤其重视为藏传佛教兴建寺庙，据统计，元朝君主在大都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有数十座寺庙的兴建带来了藏传佛教的各种艺术形式。随着与元朝交流的增多，西藏开始派遣一些当地著名的工匠进京，帮助宫廷制造西藏特有的手工艺品，并教授学徒，这其中以刘兰塑最为著名。刘兰塑是元朝时北京最为著名的金属佛像雕刻大师，如《旧京琐记》中提到："西华门内之刘兰塑胡同在后门外，即刘元之故居也。考元史工艺传，阿尼哥，尼波罗国人，授人匠总管。有刘元者从阿学，亦称绝艺。

[收稿日期]　2015－02－10
[作者简介]　周锦章（1980－），男，福建安溪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专项培训2014年中青年骨干教师一般国外访问学者研修培训项目（06714530140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元，字秉元，宝坻人，两都名刹，塑土、范金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官昭文馆大学士。尝奉谕，非有旨不许为人造像。”[2](P90-91)

到了明清时期，北京佛教的教化内容和形式都趋向世俗化，在寺庙兴建上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时期是汉藏佛教交融共存时期，相对而言，藏传佛教表现得要活跃一些，寺庙文化也极为丰富多彩。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崇尚藏传佛教，分别通过“众封多建”和“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西藏”的民族宗教政策，[3](P93) 实现了对西藏和蒙古地区的有效统治，同时也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北京作为明清两代政治中心，继续成为中央与蒙藏地方政府联系的舞台，同时随着蒙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和定居，也继续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中心。另一方面，蒙藏地区的手工业者也因为自身独特的技术，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直接来京进入宫廷服务。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最早在北京从事铜佛制作的是蒙藏地区来京的喇嘛。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宫内中正殿内设立“中正殿念经处”，准许北京各寺庙的喇嘛和由各地来京的喇嘛分期在中正殿内念经；康熙三十八年（1698），又在中正殿内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工厂，专门制造佛像，分为铸铜像、刻木像、彩画佛像、彩绣佛像四所。[4](P32)

清朝以后，随着北京大量藏传佛教寺庙的发展，独特的宗教内涵在展示巨大的文化艺术魅力之余，对藏式铜器制作在帝都的勃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源自西藏的铜佛锻錾技术逐渐在宫廷的内务府中流传，成为特色之一。所谓锻錾，大多以锻造为主，錾刻为辅。锻造是塑造形体，錾刻是装饰形体，也有的器形是以錾刻为主，锻造为辅的。[5](P90) 它们的特点是带有浓厚的蒙藏少数民族特色和藏传佛教印记。除此之外还有“蒙镶”，是在北京大量生产蒙藏用品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以吉祥图案为主，錾雕花纹密布的铜器，并大量镶嵌珊瑚、松石，与中原的金属制品有明显的区别。[6](P59) 不少本地的匠役通过学习也掌握了这门技术，同时融入了汉族地区的审美趣味。此外，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工匠们也为皇家各种礼仪活动生产铜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垮台，原先在宫廷造办处为皇家服务的工匠们在一夜之间变成无主之奴。一些工匠选择了回原籍继续发展，而绝大部分的工匠们流落北京，他们艰难地挣扎着重新寻找谋生的道路。通过访谈我们知道，安定门的关厢地区，逐渐聚集了大量从宫廷出来的铜艺工匠，他们开设铜器作坊，生产铸造铜佛及各种佛器、冥器。

二、铜器作坊与蒙藏商贸

由于铜佛锻錾工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藏传佛教的信众，它的生存和发展与传统礼俗社会的崇信活动息息相关，这决定了铜器作坊依寺而居的特点。民国年间，对长期处于为皇家服务的铜器工匠来说，形势十分严峻，但并非穷途末路，他们通过与藏传佛教寺庙和蒙藏少数民族千丝万缕的关系逐渐找到自己在北京的位置。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安定门的关厢地区。

首先，北京藏传佛教的中心之一东西黄寺位于安定门关厢地区。据《宸垣识略》记载：“东黄寺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校场北，顺治八年敕就普静禅林兴建。”“西黄寺在东黄寺西，雍正元年建。”[7](P242) 《东华琐录》记为：“东寺建于顺治初，西寺建于雍正初。东寺名普静，系活佛恼木汗所建，西寺名达赖庙，为班禅额尔德尼所建，皆喇嘛庙也。”[8](P156) 东西黄寺，当年盛极一时，每年对铜佛器的需求量极大，铜器作坊的生计自然不成问题。同时，平日香火不断，吸引来自北京内外城的人们，包括在京的大量蒙藏人均来此朝圣。尤其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东西黄寺举行跳布扎即“打鬼”佛事民俗活动时，观看的群众数不胜数，众多的香客和游人往往从庙里求一尊佛像回家以保平安顺利，自然给安定门关厢的铜器作坊提供了无限的商机。再者，东西黄寺庙里的喇嘛均来自蒙藏地区，通过原籍关系、亲属关系或者师徒关系，他们乐意与从宫廷中流落民间的这些铜器工匠们合作，双方互惠互利，工匠们遂在此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生存坐标。

其次，安定门关厢的外馆乃是当时外蒙古在京的商业中心。所谓外馆，夏仁虎所著《旧京琐记》上有解释：“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旁者曰外馆。年班王公，迨秋而集，如鸿雁然，福晋郡主亦至焉。”[2](P92) 最初它是外蒙古宾馆所在地，是接待蒙古贵族、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员来北京觐见清朝皇帝的地方。后来，一般外蒙古民众来北京也都住在此处。蒙古地处北方大漠，居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由于当地生产落后，包括铜佛器在内的许多物资均需内地供应。因此蒙古人无论贵族、官员，还是一般牧民，来至北京都大量采购他们所需的物资。这使得有眼力的商人在蒙古宾馆附近开设店铺作坊，日久就形成了独特的商业区。

据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清末民初外馆的商业非常繁荣："两黄寺之东，为蒙古外馆。市廛栉比，屋瓦鳞次。充街隘巷，只见明驼；列肆连箱，惟陈服匿。而居人除蒙古外，皆贾人也。殷殷阗阗，有如素封矣。"[9](P181) 工匠们选择此处开设铜铺作坊，除铜佛器之外，开始大量生产专供蒙藏地区日常生活所用的各种铜制品，包括铜盘铜壶之类的器具，受到蒙古人民的欢迎。1932 年《北平市工商业概况》一书中也提到："当前清时，蒙汉贸易甚盛，安定门之外馆地方，铜店聚集，造铜器及铜质佛像，颇为驰名，专销于外蒙。又如文具烟袋等类，须由铜业专行制造者，其行销各省，为数亦巨。"[10](P430)

铜铺作坊的经销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铜器批发给专跑蒙藏口的中间商人，通过他们投放于外蒙市场。这些商人后来成立了进出口贸易公司，是铜铺作坊坚实的生意伙伴和盟友。应该说，铜铺在蒙藏地区的声誉归功于这些批发商们。另外一种是直接零售。外馆附近居住着大量的蒙古人，是庞大的顾客群体。他们信奉喇嘛教，喜欢肉食，喝马奶和砖茶，闻鼻烟，穿皮毛，戴毡帽，铺地毯。住在外馆一带的北京商人生活习惯虽然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但是为了做生意与蒙古人打交道，首先必须学会蒙古文，会说蒙古话，还要能喝马奶、砖茶等。[11](P55-56) 这些对于铜铺作坊的工匠们来说有着天然的优势：不少工匠们就来自蒙藏地区，与蒙人在生活习惯上并无差异；另外一些工匠们由于在宫廷中师从来自蒙藏地区的匠人，大多能操蒙古语，对蒙古的生活习惯更是了如指掌，因此他们在外馆一带成为最受蒙人欢迎的群体。

然而，外馆地区的繁荣是短暂的。由于俄国势力的干涉，蒙古几度宣布独立，并将中央政府官员们驱逐出境，至 1924 年，宣布成立"蒙古共和国"。从 1927 年起，外蒙当局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实行限制，并提高进出口税率，对中国商人在库伦的货物财产实行重估，超过原估价者限期补纳税款。如此，外馆的商铺作坊已不能继续营业下去，约在 1930 年初，外馆各杂货行、杂货栈相继歇业。[11](P55) 铜器业因此损失巨大，"自外蒙隔绝而后，内地风尚骤殊，凡旧式金属之精品，类多鄙弃不用，铜业实首蒙打击"。[10](P430) 刚刚从宫廷陷落中稳定下来的铜匠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

三、铜器作坊与地方信仰中心

从 1911－1930 年初，在短短的 20 年间，铜铺作坊遍布安外关厢地区，不少作坊在保持原来宫廷手艺的同时，主动地与外地进京的汉族铜匠交流，制作工艺上逐渐倾向世俗化，特别是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这标志着皇家工匠们逐渐融入北京的地方社会生活中。同时，他们开始在民间大量招收学徒，传授手艺，进一步使铜器制作工艺民间化，铜铺的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不少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加大破除封建迷信的力度，加之现代化的社会风气使然，宗教用品渐渐被社会所淘汰。其实未必，只不过它们转变成中下层民众的民俗生活方式，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顽强地生存。1926 年，陶孟和主持了一项关于北平市生活费之分析研究的项目。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普通市民家庭中都设有佛龛，祭祀用具（包括铜佛、香炉和锡蜡烛台等）是家庭用品中最值钱的物品之一。[12](P76) 可见社会对铜佛产品需求量大，并且深入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

1930 年以后，随着安定门关厢地区商业环境的萎缩，不少铜匠们将作坊搬到内城的雍和宫附近地区。清朝中期以后，雍和宫乃是北京藏传佛教的重心所在。此举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的选择。从历史上看，乾隆帝即位后，于乾隆九年（1744）将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庙，皇帝就利用中正殿替代内务府，充任管理雍和宫宗教的最高机关，改名"中正殿管理雍和宫喇嘛念经事务处"。这时中正殿的组织扩大了，并且不用喇嘛为首领，而以亲王或贝勒会同一、二品大臣为首领，名曰"中正殿管理大臣"。"事务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下设三房，其中第三房称为“造办房”，就是制造佛像的小工厂，设造办员外郎二人，领催（即工头）一人，匠役（即工人）40 人。这 40 名工人，分铜金、镀金、铸铜、雕刻玉石、雕刻牙木、采画、装金、彩绣、缂丝等九组。[13](P32-34) 这些喇嘛工匠的来源与内务府造办处一样，均来自蒙藏地区，两者之间的结合应该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雍和宫在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融会了汉、藏等民族的建筑风格，各殿堂文物众多，有佛像、唐卡、佛教经典、经物、法器，还有清朝历代皇帝作为供佛礼品赐给雍和宫的御用珍品。可以说这些文物代表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精华，其艺术价值不可估量。民国之后，雍和宫开始对外开放，原本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遥不可及的宗教宝物尽数收归眼底，也成为当时京城工匠们揣摩手工技艺和竞相模仿的对象。民国以后，政府对雍和宫的特权和补助越来越少，1935 年之后干脆取消，宫中 800 多名喇嘛不得不各谋生路，有回蒙旗的，有回西藏的，也有在北京落户做小本营业的。那些仍然留在雍和宫的喇嘛只能设法维持个人和庙宇的生存，他们利用自身的手艺在庙内开设铜铺作坊或者蒙藏民族工艺品商店，通过与世俗行业的结合，保证寺庙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信徒来源。

同时，雍和宫的喇嘛还把空余的庙房租给流动的工匠群体，收取微薄的租金。雍和宫内喇嘛的宿舍叫“连房”。这些房子位于昭泰门外的东边，分东中西三路，每路分 10 连，东中西三路共 30 连。在清道光朝，把西路第 1 连至第 5 连，改建阿嘉呼克图的佛仓，故此雍和宫的连房，只有 25 连了。所有东中西三路连房，共街门 33 个，瓦房 370 间，灰房 31 间，门道 1 间。如果再把各佛仓的房屋 230 间也加在一起，这大小喇嘛宿舍的建筑，已然有 643 间的灰房和瓦房及 12 间游廊的巨大数目了。考 1935 年雍和宫喇嘛登记册，偌大的雍和宫内，当时只有喇嘛 221 人，僧舍大量闲置，只得出租，有同乡关系、亲属关系或者师徒关系的铜匠们自然是租房对象的首选。从 1948 年北平市户口登记册可以发现，王增、韩世清、解万兴和王德等人开设的铜铺作坊，均位于雍和宫庙内。通过调查得知，雍和宫的一些喇嘛在这些作坊有微薄的投资，显然是为自己的身后事积累钱财。1935 年，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设于雍和宫内，此处遂取代外馆成为在京蒙藏人的政治中心和聚居区。蒙藏地区一向是铜铺的主要销路，作坊自然要围着蒙藏人转，这是铜铺生存的最坚实的保障。此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雍和宫的东墙外就有铜厂，便利的原料来源也是铜匠们聚集于此的原因。

另一方面，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内三区雍和宫大街附近狭小的地区里，集中了包括雍和宫、柏林寺、孔庙、毗卢庵、火神庙、天圣寺、土地庙、真武庙、观音寺、龙王庙、海潮庵、报恩寺、宝公寺、精忠庙等涵盖儒释道三教的各种庙宇，成为北京庙宇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既有雍和宫和柏林寺这样名声在外的皇家大庙，也有名不见经传的社区小庙，它们是临近胡同老百姓的朝圣中心和公共活动场所。铜铺作坊集中于此，既是经营祭祀用具的首选，又是技术发展的需要。通过调查我们知道，作坊的师傅还经常带着徒弟们到寺庙参观佛像，吸收各派锻錾工艺的菁华，发展自己，可见庙越多，自然越有利。[14] 当然，这一地区位于东直门和安定门交汇的通衢大道上，来往的各地商人自然不少。通过上述寺庙中的碑刻，我们发现此处还是各种行业组织活动的中心，所以雍和宫附近地区无疑是铜匠们做生意的风水宝地。

从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一份《1950 年特种工艺品制造业银兰会员情况了解表》得知，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解放初期，雍和宫附近地区的铜铺逐渐形成了从原料、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内部分工和规矩。[15] 在这份长达 360 页的调查登记中，北京约有近 100 个铜铺，近 50% 分布在五道营、安内西城根、安内东城根、雍和宫大街、国子监街、国学胡同、官书院胡同、雍和宫内及北新桥附近的小胡同里。如果以雍和宫为圆心的话，这些街道和胡同就是半径，形成了一个铜铺产销的圈子。从分工上看，有的作坊负责配活，有的负责轧铜板，有的作坊负责打铜胎，有的磨光及璇活，有的錾花和雕刻，最后有的作坊进行烧蓝镀银的装饰性工作，形成一件完整的铜器之后交给固定的铜铺或中间商人售卖。整个过程分工明确，铜铺各司其职，相互之间基本都有师承渊源。由于铜佛器制作工艺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劳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动，大多数从业者穷尽一生也只能掌握某个环节的关键。这既保证了行业的相对封闭性，也使行业技术在传承过程中难以保存下来。因此工匠们只能在产销过程中采取联产联营的策略，从而形成行业网络，保证行业在动荡的民国北京社会中得到了一席安身之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定都北京的王朝统治者以虔敬的态度接受藏传佛教信仰，少数民族的铜器工艺得以传入京城并因之勃兴。民国初年，面对社会转型的压力，原先在宫廷造办处为皇家服务的工匠们凭着敏锐的行业嗅觉和原有的社会关系网，逐渐聚集在安定门的关厢地区，利用自身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和精湛的技术，开设作坊铸造并售卖深受蒙藏人群喜欢的各种铜器工艺品。随着安定门关厢地区商业环境的萎缩，不少铜匠们又将作坊搬到内城的雍和宫附近地区，一方面借助地方庙宇的佛像资源不断探索改良工艺的方法，另一方面通过租赁关系、地缘关系或者师徒关系形成资源互补的行业技术网络。总之，在北京民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中，铜佛器作坊始终在维持行业特点与融入地方社会之间寻找平衡点，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行业发展模式。

注释：

[1] (明)宋濂等. 元史 [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清) 夏仁虎. 旧京琐记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3] 周润年. 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 [J]. 西藏研究，1993 (3).
[4] 金梁. 雍和宫志略 [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5] 华觉明等. 民间技艺 [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6] 王绎等. 北京工艺美术集 [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7] (清)吴清元. 宸垣识略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8] (清)沈太侔. 东华琐录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9] (清)震钧. 天咫偶闻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10] 池泽汇等.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 [M]. 北京：北平市社会局发行，1932.
[11] 王永斌. 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12]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13] 金梁. 雍和宫志略 [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4] 被访谈人：G 某，男，66 岁，北京金属工艺品厂退休工人。访谈时间：2007 年 4 月 18 日。访谈人：周锦章。
[15] 1950 年特种工艺品制造业银兰会员情况了解表 [Z]. 北京市档案馆. 87 -5 -4.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ronze Workshop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ZHOU Jin-Zh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bronze workshops in Beijing in the era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and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produce and sale of bronze workshops, minority business and local faith center.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paper are: because of the changes in modern city, the bronze workshops acted up in different levels to maintain the specialty and stabilization.

Keywords: Beijing; Republic of China; bronze workshop; minority business; local faith center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